

略论艾芜早期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

胡永修

内容提要:艾芜在他的早期小说中,以执着的现实主义精神紧紧地拥抱现实,真实地再现现实,创造出了别于其他作家的崭新的典型环境中的流浪者典型形象。他根据自己对客观现实的“深刻的、包罗万象的、富有人情的”理解,把客观真实具体的描写叙述与鲜明的抒情议论有机结合,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从而体现出了特有的现实主义特色。

关键词:艾芜 小说 现实主义 流浪者形象

艾芜是30年代初出现在左翼文坛的一颗耀眼的新星。他从1932年开始发表了大量作品,在1935年前后连续出版了《南国之夜》、《南行记》、《芭蕉谷》等短篇小说集。他的作品一面世,就以其独特的题材领域和鲜明的艺术个性引起了文坛的广泛注意。同时,他早期小说中体现出的艺术倾向使人们产生认识分歧,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艾芜这时期的小说是“忠实于他认为生活所应该有的样子”反映生活,“有强烈而鲜明的感情倾吐”,因而其艺术倾向是浪漫主义的^[1]。文学创作现象本身是复杂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时是互相渗透的,浪漫主义作品里常常包含着某些现实主义因素,现实主义作品里也常常存在着某些浪漫主义成份。艾芜早期的小说创作在这点上表现得更为复杂。但是,我们认真研究艾芜早期的小说,不从个别因素、而从总体上把握,就会得出符合作家创作实际的结论:艾芜早期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

艾芜是鲁迅培养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直接受过鲁迅先生的教诲,并深得鲁迅先生的真传。他根据鲁迅先生的教导,紧紧拥抱现实,真实地再现现实,他早期的小说创作中有一种执着的现实主义精神。

艾芜始终认为:“文学是服务于人生的,它的功用是不断地表现人生,批评人生,指导人生。”^[2]多年的漂泊流浪生活,使他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时的横行霸道和下层社会人民的苦难生活。1931年4月回到上海后,就决心献身文学事业,以文艺为武器投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战斗行列。

30年代初,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兴起的时期。这年轻幼稚的新兴阶级的文学在理论和创作中都存在有“左”的思想的影响。创作中脱离现实生活和标语口号的倾向比较突出。当时有些普

罗小说作家虽然抱有满腔的热情,具有鲜明的倾向性,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生活的实感,凭借自己的主观想象进行创作,因而他们的作品往往流于政治概念的图解,人物形象苍白无力,缺乏艺术感染力。艾芜不愿走这些普罗小说作家的路,“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划出来”,表现他们“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3]。但是,艾芜当时接触、了解和熟悉的人物都不是革命者,而是“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对于这样一些与当时普罗小说所反映的不同的生活和人物可不可以写,写出来“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他感到“迟疑”和“犹豫”不决^[4]。于是与沙汀联名向鲁迅先生请教。

鲁迅得到艾芜和沙汀的来信后,对这两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写了回信。鲁迅谆谆教导他们:“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意义的。”^[5]信中鲁迅明确肯定了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从生活实际出发进行文学创作的正确道路。他说写进作品中的“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作这一时代的记录”,“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6]。鲁迅要求他们“不必趋时”,更“不可苟安”、不要“沉没”。

鲁迅的回信使艾芜认清了方向,鼓足了勇气。他看清了自己创作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坚定了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信心和决心,开始了他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远行。他早期在进行创作时,牢记鲁迅的教导,始终执著于现实,真实地再现自己熟悉的生活。

艾芜最初发表的小说《人生哲学的一课》,是根据自己1925年秋天漂泊流浪到云南昆明时的所见、所闻、所遇、所作、所感创作的。作把旅店老板,车行经理,公馆的老爷、太太,以及他们的骄奢淫佚和生活在底层的受苦人进行鲜明的对照,通过生动,真实的描绘,启示读者:“这样的世界,无论如何,须要弄来翻过身了。”^[7]他早期著名的小说《山峡中》、《松岭上》则是作者从昆明经过云南西部,进入中缅交界的克钦山地区生活的形象记录。作品表现了一个怀着美好理想的知识青年坠入生论底层,过着孤独、贫困、痛苦的流浪生活,并根据他的所遇,反映了被社会撵出正常轨道的人们的苦难生活。《在芳草地》、《洋官与鸡》、《我诅咒你那么一笑》等小说,是作家根据自己在滇缅相交的茅草地求生之时的经历创作的,小说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对人民的欺压、蹂躏与精神奴役。《我们的友人》是以作家从芳草地到仰光的途中,在八莫那间下等客栈里的一段生活创作的。小说写了一个沾染了不良习俗而心地善良的下层人物老江和几个失业的汉子之间真诚而粗犷的生活。《我的爱人》是作者根据仰光拘留所里关押的一位缅甸沙拉瓦底参加暴动的农民领袖妻子的遭遇创作的,作品真诚地流露出了对缅甸人民的眷恋和对农民暴动的同情……

艾芜早期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有一个真实的背景,都记载着作家的一段生活,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它并不是有些评论家所说的,艾芜早期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是“忠实于他认为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反映生活”,艾芜是执著地忠实于他所见到的现实生活的本来样子来反映生活的。从一开始,他的小说就“执拗地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一切虚无缥缈、空中楼阁的幻象都与他的小说无缘”^[8]。他是把自己“身经的、看见的,听见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给写了出来”^[9]。早期的小说充满传奇的色彩,有异域的风景风俗,这是因为作者本人在西南边境地区和南洋诸国漂泊了整整六年,他有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奇特的遭遇。他深谙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和南洋诸国人民的生活习俗,他目睹了祖国西南边陲和南洋诸国旖旎的风光,他只不过把这些通过自己艺术的再创造,真实地记录下来。

二

“现实主义的意思,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0]。文学形象的典型化,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标准。哲学要求涵盖的普遍性,文学要求它表现的独特性。文学总是用个别反映一般,用典型的形象来揭示生活的本质,这就决定了文学形象独特的品格。越是具体的真实的东西,就越有它的独特性;越有独特性的品格,就越显示它的实际存在。抽象化,一般化往往会失去其独特性,也失去实际存在的真实性。因此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家,总是能用他那一支笔在作品中塑造出鲜明突出的“这一个”,他总是通过“一个”、“一个”的存在,反映生活的某些本质。艾芜早期的小说在这方面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

艾芜早期的小说中刻划得最成功的形象是流浪者形象。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先刻划流浪者形象的并不是艾芜。先有潘训《乡心》中的阿贵,王任叔《疲惫者》中的运秧驼背;其后有蒋光慈《少年漂泊者》中的汪中,洪灵菲《流亡》中的沈之菲。但艾芜却在他的早期小说中塑造出了别于他们的众多的崭新而独具特点的流浪汉典型。

《人生哲学的一课》中的青年流浪者“我”,经历了艰难困顿的生涯。他从几千里以外,经过险山恶水,长途跋涉来到昆明。在这座陌生的城里,穷愁无依。他在漂泊途中用尽了最后一文钱,被迫接受店老板的安排,和浑身长疥疮的人同睡一铺。饥饿难忍,便摆出有一担草鞋要卖的生意人的正经嘴脸,拿自己唯一一双值几百文钱的草鞋去跟车夫、小贩讨价还价。其后去求作黄包车夫、工厂学徒、有钱人家的厨子,由于没有铺保和保证金,连这种变牛变马的资格也未获得。最后在旅店连一双旧布鞋也被人偷走,于是他借机与店老板大吵大闹,索赔到了一双比自己的脚短了一寸的半新旧的布鞋,却被店老板赶出了旅店。面对这种生活的绝境,他没有象洪灵菲笔下的沈之菲那样悲伤颓废,也没有象蒋光慈笔下的汪中那样一度消沉。相反,他从中上了一堂人生哲学课,坚定地表示:“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脚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这个具有人的求生意志的年轻漂泊者,艾芜让他在早期的小说中,走过了一条由国内而国外的漫长的流浪之途,给予在人生多变的道路上的行人以极大的鼓舞。

《山峡中》,艾芜塑造的野猫子形象更独特。她是艾芜早期小说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这个过着流浪生活的强盗的女儿,是一个既可爱又可怕的少女。有人称她是吃狼奶长大的。她泼辣强悍,充满原始的野性。她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扯谎、行窃、耍刀等强盗的全套本事。表面看来,她非常的残忍。行窃时,她把目标引向同伙小黑牛;小黑牛挨打受伤后,她又参与策划,把他抛入江中;当“我”知道惨剧的真相,决心离开他们时,她规劝、引诱不成,便用武力相威胁。另一方面,她又天真活泼、心地善良,和别的少女一样,充满着对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她向父亲撒娇;她作小木头人的“妈妈”;她唱歌谣:“江水呵,慢慢流,流呀流,流到东边大海头,那儿呀,没有忧。那儿呀,没有愁。”当她知道“我”一定要离开他们时,第二天清晨,她和她的同伙主动离开了“我”,临行前还给“我”留下了三块银元。这一切都表现了她的天真、善良和渴望美好生活的理想。她身上的野性和残忍是残酷的人生和黑暗的社会现实强加给她的。正如她父亲魏大爷说的,天底下对待我们更要残酷的人苍蝇一样的多,“吃我们这行饭,不怕挨打就是本钱”,“我们的学问”,“一句话,就是不怕和扯谎”,“在这里,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正是这种叫人活不下去的社会,让

野猫子这样铤而走险的人扭曲了灵魂,带上了强悍的残暴与野性。小说通过野猫子形象的塑造,深刻地揭示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象野猫子这样的艺术典型,是绝无仅有的。

艾芜早期的小说描写的大多是象野猫子这样的具有野性不驯之美的艺术形象,他们当中有偷马贼、走私烟贩、滑竿夫、马头哥、强盗、小偷等。这些人被旧社会抛出了正常的生活轨道,多半是没有固定职业、没有财产、没有房屋、没有正常的谋生手段、到处流浪的野人。作者通过他们桀骜不驯的灵魂,通过他们特殊的“世界”,通过他们独有的是非标准和人生哲学,否定一切既存的秩序、现有制度、传统的道德道义。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在此之前无人涉及的人物系列。现实生活是丰富多采、复杂多变的。作家通过艺术形象能反映社会生活的进步、历史发展的要求、人们为之而进行的斗争,能体现较强的社会内容,具有典型意义。作家通过自己熟悉的社会生活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能表现人物心灵上某些时代的烙印。他们的追求、奋斗体现的人的社会情感和本能要求,同样也能揭示社会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艾芜早期小说中的艺术形象,虽然远离当时时代潮流的冲击圈,但他们从一个侧面,以独特的方式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揭示出了某些本质特征,具有典型意义。

三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客观的创作方法,并不排斥作家的主观性。恰恰相反,它要求作家在充分尊重生活客观性的基础上,热情地拥抱生活,对生活作出积极的主观审美评价。因为艺术并不是生活的复制品,艺术家绝不会对现实生活作照像式的反映。真正成功的艺术品,必然反映出作者的主观审美评价。现实主义的这种主观审美评价“不是由于自己的局限或片面性把诗人所描写的对象的客观现实加以歪曲的主观性,而是深刻的、包罗万象的、富有人情的主观性”^[11]。现实主义作家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总是根据自己对客观现实的“深刻的、包罗万象的、富有人情的”理解,在自己作品中或隐或现、或深或浅、或强或弱地流露出自己的感情和倾向性,以引起读者思想的共鸣,从而感染读者、影响读者。

文学史的史实告诉我们,不同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他的作品里流露自己的感情和倾向的方式是不同的。同是现实主义作家,有的是在冷静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有的是在冷静客观的描写中借叙述人的嘴恰当地发议论;有的则在写实的基础上,融入抒情、象征、哲理以及杂文式的议论。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艾芜,他早期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是把客观真实具体的描写叙述与鲜明的抒情议论有机结合,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艾芜在谈到他早期的小说创作时,曾经说他“不是平平静静着手描写,而是尽量抒发我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的。因为我和里面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道受过剥削和侮辱。我热爱劳动人民,可以说,是在南行中扎下根子的,憎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封建地主的统治,也可以说是在南行中开始的”^[12]。作者在早期漂泊流浪的南行生活中,尝尽了人间各种疾苦,接触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对他们的痛苦有深切的体会与了解,对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有充分的认识,因而他在作品中不是平铺直叙地叙述。艾芜写人民不幸的生活遭遇,愤然不平之情力透纸背,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人物悲剧命运深深的不平与同情。艾芜写人民的反抗,讴歌之情溢于言

表。如在《乌鸦之歌》中,作者对被黑暗社会逼疯了青年的反抗精神发出了由衷的赞美。特别突出的是,艾芜在早期小说中,对被黑暗的社会现实扭曲了性格的被侮辱者与与被损害者,仍以满腔热情突出他们人性中的真善美。如《松岭上》的老货郎,《森林中》的马哥头,《偷马贼》中的老三,《我的旅伴》中的老何,《山中送客记》中的大老杨,《流浪人》中的矮汉子等等,因为生活所迫,有的杀过人,有的作了走私贩,有的当了强盗,有的作了小偷……但在小说中,作者却突出了他们的乐观、豪爽、友谊、信任、同情、讲义气、重信用和不屈的性格。作家“像淘金人一样”,“保留着他们性情中的纯真”^[13],从他们那些被生活扭曲了的行为里,揭示出了他们闪闪发光的美德。无怪乎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健君说,读了艾芜早期的小说,使我们感到作者笔下的这些人“多粗野,多残忍,多温存,多忠厚,多可爱,一句话,多原始!”“我们爱那群野人,穷人,苦人”^[14]。与此相反,艾芜早期的小说,对造成下层人民悲惨遭遇的黑暗社会发出了切齿的诅咒。他还在《我诅咒你那么一笑》、《洋官与鸡》等小说中对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敲诈勒索、奸淫妇女进行了无情揭露,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掩饰不住的愤怒。

在艾芜早期小说中,有相当部分作品都以第一人称写,作品中常常有一个“我”。这个“我”不象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我”那样,完全用主观感情去表现身外的世界,或是在想象中发展自己那些被压抑住的心理。在作者的笔下,这个“我”有时是故事的参与者,有时是故事的接受者,有时是故事的目睹者,而有时却在故事中只起穿针引线的连接作用。他的出现,大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生活真实感。不仅如此,作者有时还让他以一种热情、开朗、天真、诚恳的表情对作品中所描写的现实世界发议论、谈感慨、说感想。《人生哲学的一课》中的青年流浪者“我”在昆明目睹和经受了上层社会的骄奢淫佚和下层社会受苦人的磨难以后,真切地发出感慨:“这样的世界,无论如何,须要来个翻身了。”《快活的人》里,性格开朗、聪明、善良的手艺人胡三爸在禁烟以后,停业了用破伞的铁签做烟签的生涯,而去茶馆帮人捶背,以打浑说笑取悦于人,生意红火引起同行嫉妒而被打死,死后还要被人取笑。目睹这一切的“我”感到,“其实胡三爸是活得糊里糊涂的啊!”……这些议论、感想、感叹画龙点睛地指出了作品中描写的人物、事件的意义,也鲜明地表明了作者自己的感情、倾向,不断地呼唤着读者感情的共鸣。

有的评论者在评价艾芜早期小说时,因为作品中表现了主观抒情性,于是断定它是浪漫主义的。这种判断显然不够全面、准确。不错,如前面我们所分析的,艾芜早期小说有主观抒情的成分,但是这种主观抒情是建立在现实人生客观描写的基础之上的。艾芜早期的小说重点再现的是一幅幅现实人生的图画,作者的主观抒情并没有改变艾芜早期小说的现实主义倾向。

注释

[1] 谭兴国《论艾芜的独创性》。

[2] 艾芜《文学手册》。

[3] [4] 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来信》。

[5] [6] 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回信》。

[7] 艾芜《人生哲学的一课》。

[8] 洁民《试论艾芜的创作道路》。

[9] 艾芜《原〈南行记〉序》。

[10]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11]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

[12] 艾芜《〈南行记〉新版后记》。

[13] 艾芜《我的旅伴》。

[14] 李健君《里门拾记》。